

《佛國記》西譯研究與傳播（一）

許尤娜

法顯及《佛國記》自唐代之後，罕見漢文稱引，宋明清三代僅得兩位文人品鑑。然而十九世紀卻在「西方歐陸」，得到第一代學院漢學家高度看重，以法譯和英譯方式出版問世。釋法顯在五世紀初完成十五年陸去海還的天竺朝聖，對一千四百年後、意欲丈量世界的歐洲學者而言，依然是一種「古今罕有」的人類極限經典；歷劫歸來後寫成《佛國記》，經過時間淬煉，終被另一個文化肯認為無可取代的人類文明遺產。

一八一五年法蘭西學院設立漢學教席，聘任自學漢語成果驚人的雷慕沙為第一位漢學教授。自此，「漢語」正式被納入學術領域，在學院之內以系統性方式被傳授與被學習。雷慕沙以其漢學興趣和多語專業，在獲得法顯《佛國記》中文文本之後，立刻興致勃勃積極投入研究。以雷氏為首，法蘭西學院建立師徒相承學風，在短時間內完成中世紀三位求法漢僧「天竺朝聖行記」的法文譯注，為歐洲學界揭開漢語文明的神祕面紗，更為歐洲佛學研究者，開啟「漢傳佛教」新視閾——在南傳

巴利文佛典之外，還存在著由梵轉漢的北傳佛教經典。《佛國記》儼然嫁接了十九世紀「歐洲——印度——漢地」三地的「佛教」對話與研究。

五世紀漢文《佛國記》，在十九世紀跨越萬里「西遊歐陸」的事實與現象，突顯了哪些「中國視閾」忽略的特性？是否反映出近代歐洲的特殊時代處境與精神面貌？西方科學觀點下，漢學家從《佛國記》看到、發掘到什麼樣的內涵？如何啟發導引「中文」學界的自我觀看視角？面對法、英、德近二百年的法顯研究成果，中國文學界是否宜有適切回應？生長於漢傳佛教文化土壤上的中文研究者，如何善用古典漢學與大乘法義優勢，綜理中西二百年研究成果，為法顯及其《佛國記》，作出恰如其份的詮釋與評價？

筆者欲盡可能周延回答上述提問，然而限於學力和篇幅，所作仍處於起步階段。在這篇文章中，試圖將文本置於中西文化交流視野，全面整理法顯《佛國記》兩百年來的西譯研究，展示《佛國記》在歐陸透過學術被

理解、被容受的歷程。先略述歐洲漢語學習與漢學研究歷程，簡介法蘭西學院首位漢學教授雷慕沙對漢學的貢獻，論述其《佛國記》法文譯注如何結合漢學與佛學。後依時間先後，次第討論《佛國記》法譯、英譯與德譯三種西語的譯注研究，突顯不同譯者的譯注特色。限於篇幅與學力，借重各譯者書前〈序言〉、〈導言〉，摘述重點，指出兩百年來歐洲漢學家如何選擇本文相關材料、如何在形式與內容表現其翻譯旨趣。

壹、歐洲漢學與漢傳佛教研究

一、從傳教士漢學到學術化漢學

(一) 始於傳教之需的漢語學習
自十六世紀中葉，因商業與傳教之需，歐陸展開對「漢語」的興趣與學習。¹

中國與歐洲文化之真正接觸，始於「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東航而來。²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葡萄牙人入據澳門；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前後，開始合法長期租住從事貿易。與此同時，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其中，「天主教」耶穌會（Compagnie de Jésus）傳教士發揮核心

作用：在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一五二八—一六〇六）的傳教方針下，傳教士羅明堅（Michel Ruggieri，一五四三—一六〇七）和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五二—一六一〇）成為西方最早的漢學家，促成西人學習漢語的第一個高潮期。³

史傳最早東來傳教的耶穌會士為方濟各·沙勿略（S. François Xavier，一五〇六—一五五二）；但耶穌會遠東傳教最重要的策略，卻是范禮安所提出：在華傳教「最重要之條件，首重熟悉華語」。⁴ 他安排義大利人羅明堅及利瑪竇學習漢語，兩人進而成為西方最早的「漢學家」。⁵ 羅明堅以漢語布道，並排除萬難成立「聖瑪爾定」語言學校；後來一五九四年成立的聖保祿學院（Colégio de S. Paulo）甚至將漢語列為必修。而利瑪竇一五九五來華，採取「合儒排佛」態度，適應、尊重儒家文化。兩人一返歐陸一留華地，合力將范禮安的傳教理念付諸實踐，促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謂「西人學習漢語第一個高潮」。

西人漢語學習第一個高潮表現在四方面：第一，穩定的教學機構和漢語教材，如利瑪竇將《四書》作拉丁文—漢文對照，提供入華傳教士學習中國文化。第二，入華耶穌會士著手中譯西方文獻，如利瑪竇與徐光啓

合譯《幾合原理》最為代表。第三，入華傳教士開始中文著書，如利瑪竇中文著述有二十四部，其中有十三部甚至收入《四庫全書》；而乾隆禁教之前入華傳教士，亦多能以中文寫作。第四，編輯漢語辭典和語法書，如羅明堅與利瑪竇合編《葡漢辭典》，雖未出版，但卻是第一部漢外對照辭典，亦是首部拉丁文字母與漢語對照辭典，不但對歐人習漢語占重要地位，亦對研究漢語拼音史有重要意義。語法書方面，第一部為多明我會修士萬濟國（Francisco Varo，一六一七—八七，又名瓦羅）以西班牙文編寫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⁶但就系統性而言，首部成功的漢語文法書，則屬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一六六六—一七二六）在一七一八年於廣州寫成的《中國語言志略》（*Lingue Sinice*，又譯《漢語札記》）。此書將漢語區分為文言與白話，奠定了近代漢語語法研究之基礎，但卻塵封於巴黎皇家圖書館一百年，十九世紀初經雷慕沙發現，一八三一年才於麻六甲出版。⁷

由於「禮儀之爭」，天主教在華傳教受清廷嚴控；⁸加上雍正、乾隆兩朝明令「禁教」，天主教耶穌會在華影響力日益式微，二百年熱烈的中西交流場面亦暫

告段落。⁹十九世紀為中西文化交流開創新局面者，轉為「基督教」新教傳教士。

二) 對漢語語法的探索研究

相對於入華傳教士自十六世紀在漢地展開漢語學習，歐洲本土文化界的漢語學習顯得起步甚晚。¹⁰漢文方塊字第一次出現在西方書籍，是西班牙傳教士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一五四五—一六一五）的《中華太帝國史》，一五八五年首版於羅馬；¹¹然影響較大者為基爾歇（Athanasius Kircher）《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一六六七），書中首度公布中國一些象形古文字，引發歐陸文化界廣泛興趣。他並將《大秦景教碑》碑文編成拉丁文—漢文對照的詞典，含發音及詞義，被視為歐洲人學習漢語首部「拉—漢詞典」。

漢語研究方面，英人韋伯（John Webb）透過閱讀傳教士著作，首度將漢語放入世界語言研究範疇，其著作《論漢語之為人類原始語言的可能性》（*An Historical Essay E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一六六九），提出漢語是人類「原始語言」觀點，在歐洲思想史具有一定地位。德國方面有米勒（Andreas Müller，一六一〇—一六九四）在著

名的《漢語奧祕》（*Proposito Clavis Sinica*）宣稱已找到學習漢語之鑑，可很快讀懂漢語；哲學家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一六四六—一七一六）因此多次與之透過書信討論。¹² 另，俄國巴耶（T.S. Bayer，一六九四—一七三八）亦嘗試研究漢語文法文獻。¹³

雖然歐陸自十六世紀陸續得到傳教士寄回的漢語資料，但至十九世紀初，歐洲學界仍普遍認為「漢語是一種沒有語法的語言」。¹⁴ 前述一七二八年馬若瑟手稿《漢語札記》於一八一五年才被雷慕沙重新發現並正式引用。在此之前，歐洲學界對漢語可謂仍停留於文字論述而無語言分析；¹⁵ 萊布尼茲甚至說過，漢字好比是「聲音發明的文字」。¹⁶ 可見直到十九世紀初，歐洲對「漢語」及其語法仍十分陌生。

一八〇七年倫敦傳教會派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一八三四）來華，是新教來華布道先驅。¹⁷ 他在倫敦已自學中文，來華後復自學粵語與中國官話；並在一八一八年於麻六甲創辦「英華學院」，¹⁸ 傾力培育東來傳教士。英華學院不但是基督教傳教士開辦的第一所中文學校，後來亦成爲中國近代教會大學之先河。著作方面，馬禮遜於一八一五年出版英文版《漢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復於一八二三年出版二卷本《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一八一五—一八二三），是中西史上首部公開出版的英漢對照字典；後又於一八二八年出版英文版《廣東土話字匯》（*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馬禮遜入華，代表西人漢語學習的第一波高潮。此時期透過辦新式學校、重編漢語教材、著譯中西著作、創辦中文報刊等，在中西文化交流之廣度、深度與力道，都大大超越第一波。來華新教傳教士經過長年在華生活，對中國文化有超越前人的生活經驗與同理心研究，使他們後來多成爲學術專業的「漢學家」。其中，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四—一八九七）在華三十年，傳教之餘，對中國典籍進行深刻研究，畢生將中國儒、道兩家思想的重要典籍—四書、五經、老子、莊子進行英譯，引介給西方世界，奠定其在十九世紀西方漢學史上的地位；返英後就任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¹⁹ 一八八六年七十歲時，出版其學術研究代表作——法顯《佛國記》英文譯注，恰是雷慕沙法文譯著出版後半世紀。

（未完待續）

註釋：

1. 關於本文第一節「歐洲漢學與漢傳佛教研究」議題，筆者曾有論述，這裡略作修正引述之。參見拙作，〈歐洲佛學研究新視闡：雷慕沙《佛國記譯注》〉，收於學愚主編，《佛教思想與當代應用》，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五，上冊），頁三一七-三四七；特別文中第一節。
2. 葡萄牙人透過航海開啓了遠東的探險和發現。一四八八年迪亞士 (Bartolomeu Diaz) 到達非洲好望角，發現印度洋；一四九七年航海家瓦達科·達·伽馬 (Vasco da Gama) 越過好望角；一五一〇年攻陷印度西岸臥亞府 (Goa)，作為遠東根據地；一五一一年攻占中國附國滿刺加(今馬六甲)，以此眺望太平洋。參見張西平，〈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漢學研究》，一〇〇一年第七集，頁三九七-四二二。
3. 主要參考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一）；以及張西平，〈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頁三九七-四二二。
4.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上冊，頁二十一。
5. 參見張西平，〈羅明堅——西方漢學的奠基人〉，《國際漢學》，二〇〇一年第三期，頁一〇一—一五〇。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 七〇三年在廣州以木刻出版，開漢語語法研究先河，有其重要性；但真正探討語法則不到三十頁，且全書無一漢字，故實際影響不大。參見（丹麥）龍柏格著，李真、駱潔譯，《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頁二。
6. 雷慕沙在傳爾蒙《中國官話》(Etienne Linguae Sinicae)得知此書，積極尋找，如獲至寶，立即手抄該書，深入研究大受啟發，在一八二二年出版的《漢文啓蒙》中盛譽之。後透過馬禮遜努力，終於在一八三一年於麻六甲首次印行；一八四七由裨雅各 (J.G. Bridgeman) 譯為英文出版。關於馬若瑟《漢語札記》的漢學地位與一生重要成就，參見（丹麥）龍柏格著，李真、駱潔譯，《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特別是第十章「馬若瑟的身後事」。另可參見張西平，〈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兼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頁三九七-四二二。
8. 參見李天網，〈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

9. 參見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特別是第九章。另可參考白晉著，馮作民譯，《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台北：光啓社，一九六六）。
10. 參見張西平，《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頁四〇八—四一二。
11. 參見（西）門蓬多著，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
12. 參見許明龍，《歐洲十八世紀的「中國熱」》（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
13. 參見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二〇〇一）。
14. 以基爾歇（Athanasius Kircher）為代表的語言學派，認為漢字乃從埃及象形文字所派生，其拉丁文著作《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於一六六七年出版，很快被譯為荷蘭文、英文與法文。直到一八二二年商博良（Jean Fransois Champollion）辨讀埃及象形文字後，才結束此學派說法。參見張西平，《對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史的研究——論對外漢語教學史的研究》，頁四〇八—四一二。另杜邦索（Peter. S. Du Ponceau）於一八三八年在美國費城發表〈論漢語寫法系統的本質和特點〉，被視作是關於漢字研究的第一篇現代性綜合論述，他認為漢語「極少甚至沒有語法形式」（*has but a few or no grammatical form*），並稱漢語為「沒有句法的」語言，而所有其他語言則為「分析性語言」。參見《美國哲學學會歷史及文學委員會學報》第一卷，頁三三五—四四八。以上間接引用自（法）艾樂桐著，張冠堯譯，《歐洲忘記了漢語卻「發現了」漢字》，收在龍巴爾、李學勤主編，《法國漢學》第一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頁一八二—一九八。
15. 雷慕沙與德國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書信討論中，曾云「長期以來，人們認為漢語沒有語法，因為它沒有詞法，或者只有一種『原始的』語法。但從十九世紀初葉起，在辯論語法和語言與思維關係的本質時，這種語言卻成了試金石」。參見（法）艾樂桐，《歐洲忘記了漢語卻「發現了」漢字》，頁一八二。
16. 此看法後來有所修正。參見（法）艾樂桐，《歐洲忘記了漢語卻「發現了」漢字》所引馬德萊娜·V·大衛（Madeleine V. Davia）《十七及十八世紀有關文

字和象形文字之爭與辨讀概念在死文字上的應用》（

巴黎高級研究實驗學校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出版）。

17. 一七九二年基督教新教先驅威廉·凱里成立第一個海外傳教組織——浸禮宗廣傳福音會（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接著是倫敦傳教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而後一七七九聖

公會海外傳教組織——英國傳道會（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美國方面，一八一〇年

公理宗牧師成立美國（公理會）海外傳道部（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一八二九年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來台，展開美國在華持續百年的傳教。

18. 英華學院一八一八於麻六甲開辦，一八四三遷往香港

，一八四四年更名英華神學院，一八五六年停辦。

19. 參見（美）吉瑞德著，段懷清、周俐玲譯，《朝覲東方：理雅各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二〇一一）。

日本佛教組隊舞宣蘭大學再現

【本刊訊】宜蘭大學林蔭大道五四七四，有近四四年生穿著日本服飾，大跳「盆踊舞」，隨著輕快的波坎調舞動肢體，這項新鮮難得體驗，讓學生從穿衣到舞蹈過程體現日本文化。該項活動，是由外國語文學系日文老師洪若英與學生發起舉辦「歡跳吧！青春時代·日本盆踊大會」。包括台北日語老師、宜大老師得知前來參觀，也和蘭陽女中學生參與。

「盆踊」是日本盂蘭盆節時，衆人聚集，跳的一種舞蹈，專注於手部動作，原本是一種佛教儀式，在隋唐

時代經由僧侶傳到日本，與當地民俗結合，成為獨特的祭典形式，通常搭配炭坑小調演出。

學生把飾道布置的充滿東洋風，在著裝完畢後，衆人集在林蔭大道上發，三人一排大跳盆踊舞，沿路吸引很多師生觀賞，拍照。

發起來洪若英老師表示：學生上日文課，了解日本文化，都是書本上東西，為了這次體驗，她事先租借服飾，希望讓學生從布置會場、穿衣到舞蹈，從做的過程中感受日本文化與做事態度。